

● 圆桌会议

“文明之间——互惠知识与在线教育”

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2001年春,由欧洲跨文化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中心和中华文化书院共同举办的“文明之间——互惠知识与在线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二十余位学者分别来自中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加拿大。

会议由汤一介教授、李比雄教授、赵汀阳教授共同主持。从事不同学科研究的与会者立足于各自的学科特点,从经济、法律、人类学、社会学、哲学、自然科学等视角对会议主题发表意见,言论的焦点很自然地集中到中西方不同文化形态的冲突上面,也最终落实到我们一直关注的“跨文化对话”的主题上来。由于与会学者来自不同的文化和学科背景,使得这一主题的拓展与延伸通过时而平缓时而湍急的言谈得到了多层次、全方位的体现。

以全球化与“新经济”为前提

尽管与会学者立足于不同学科,“全球化”这一整体的世界发展趋势作为基本的现实处境仍然得到了大家的关注;无论赞成或否定,对这一话题的谈论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普遍的共识。其中,社会学与人文科学、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引发了更深入的思考。

会议开始,首先由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黎索邦大学的克雷斯特·德·布瓦如(Christian de Boissieu)教授发表了题为“全球化: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与新经济”的主题讲演。接着,意大利女经济学家菲奥蕾拉·柯斯托蕾(Fiorella Kostoris Padoa Schioppa)教授分

析了当今全球领域内的“新经济”现象。她认为“新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而是在经济效益方面较旧经济具备更大的活力,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通过国际互联网的技术,推动覆盖全球的一体化进程。“新经济”主要产生以下几方面的影响:首先是由上述特征衍生出来的与宏观经济的紧密联系,以及对于经济能力全方位的提高;其次是随之而来的新的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包括技术熟练工人与不熟练工人之间的冲突以及直观收入上的不平等;第三,在更深的层面上,“新经济”激活了全新的运用货币的方式以及货币在经济生活中流通的方式,这一点对于哲学认识论来说颇有启发;最后,“新经济”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对经济政策乃至经济制度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菲奥蕾拉·柯斯托蕾教授认为,目前由“新经济”的产生而形成的强势文化通过历史的演变正在展现新的趋向,这就是对于异己力量的相对容忍。当然这还是不够的,因为容忍的主体与被容忍对象之间的人为区分造成了一定的内在差异。对于不同地域文化、制度或学科的差别,甚至国际交流与民族国家内部的平衡而言,真正的认同在于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结合。因此,开放的做法终会取代跨文化交流中的相对封闭状态,在面向独立的文化个体时,平均化手段(相互协调,对立双方之一方毫无取舍地改变自身以达一致的做法)势必让位于独立自主的自由竞争。总之,“新经济”对于文化之间相互认同的启示在于覆盖全球的经济生活带来的竞争行为使得双方在自然的协调中彼此受益,因为突破地域限制的“新经济”为信息的交流、社会透明度的增加提供了真正的契机。

来自法国尼斯大学的资深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让·马克(Jean-Marc Levy-Leblonde)主讲的题目是“西方科学与认知的危机”。他认为现时的“全球化”基本上可以称之为“西方化”。他首先立足于西方背景对科学理念的变迁、尤其是始于十七至十八世纪科学理念的转向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大体划分出以下几个演进阶段:古希腊时代科学精神对技术持鄙视态度,十七世纪之前科学理论与技术曾一度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而进入十九世纪以后,这种平衡被打破,技术重新脱离科学,并逐步实现了自身社会功能的转变;这一转变一直

持续到今天,具体说来:第一,技术的类型由原来的生产型、资源型向个人享用型过渡;第二,技术的更新之快使人们逐渐失去对其社会功能进行思考的时间——这两点表现为一方面要求基础理论迅速带来可见的技术成果,另一方面将原来开放型的个体研究转变为有计划的、封闭的群体行为。这样一来,单纯的技术应用成为比科学本身更受关注的事情。这便是西方社会当前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当我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这个世界的同时,人类是否得到了新的科学认识?事实上,“全球化”意味着文化形态多样化的减少。出于对这种危机的挽回,我们所持的策略是尽量保持社会及人文学科多样化的成分,以确保对未来发展的不明确性有所应对。

会上关于“全球化”概念,各位学者也持不尽相同的看法。例如从事人类学研究的王铭铭教授就认为这一概念的实在性与用途十分令人置疑。他认为“全球化”无法为我们提供任何新的内涵,一方面,所谓“全球化”,是三十年前“世界体系”概念的现在时形式,二者的内涵是同一的,即指称“世界文化一体化”(“one world culture”),事实上,从“世界体系”到“全球化”这一转化过程的实现更多地依赖于现实因素的参与,其中的理性含量是可推敲的;另一方面,如果说“全球化”意指的是国家、民族间的界限与冲突,则这种涵义古已有之,这一点尤其不能以“全球化”的趋势对世界进程作简单理解。真实的情形是过往时代的某个区域与整体世界的交流常常超出我们的想像,他以人类学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九世纪以来福建泉州历史发展的个案。他指出九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叶,泉州是仅次于亚历山大港的世界第二大港。当时的泉州人对异族移民的态度体现出在当今社会难得一见的文化认同,而这一区域对更为广阔的文化交流充满着兴趣与愿望,他们曾经在当地政府的率领下修建了一座名为“通远王”的庙宇来表达这个意愿。这一点甚至与当时中国意识形态的导向也是十分冲突的。但泉州的历史是它自己的历史,它并没有遵循由封闭到开放的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相反,在跨文化交流成为中国迫切需要的今天,泉州人的意识却令人惊异地走向了封闭。据此,王铭铭认为“全球化”对整个世界

文化来说并不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概念。他对这一概念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一种“非西方化”的理解方式。

互惠认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关于“互惠知识”可能性的探讨逐步深入下去。在这一命题成为会议核心议题的同时,它自身特有的敏感性也分外鲜明地展现出来。北京大学的朱苏力教授作了题为“知识互惠与知识征服”的发言,他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无疑非常重要,对于交流双方来说这种跨文化对话无疑应当处于互惠状态,但他在法律社会学的调查中发现事实却并非如此,知识互惠的前提往往建立在国家权力关系的持衡之上,并且以非个体化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在这样的机制推动下,就形成了不可避免的现实:知识交流过程中必有一方被置于受动的地位,进而造成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分野。处于弱势的文化群体不但成为强势文化进行知识征服的对象,而且会在缺乏自信的心态之下将主动的知识吸纳过程转变为自我强加的过程。因此他认为,在目前状况下,不同文化知识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互惠交流,即便表面上看似互惠很大程度上也同样是一种强加。他以大学校园生活为例:来自乡村的学生进入到以城市为背景的学院氛围当中,如果他们不主动吸纳那些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知识,不去熟识原本陌生的城市生活方式,那么他们将很难摆脱被歧视的现实处境。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许就此改变自己生活的坐标,但也有一些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真正可以打动灵魂的还是被城市人视为“土气”的乡村文化。朱苏力教授强调的并不是对不同文化形态优劣的评判,而是在知识选择的过程中是否真实地奉行了内心意志,其中的关键在于不以强加或自我强加的方式建构自身的知识系统,不将本该自觉的文化选择受制于国家权力对强势地位的争夺,否则将成为一场以文化为名义的压迫。他把“平等”提升到跨文化对话的核心地位,强调这种“平等”不仅是逻辑上的,而且更重要的,应是现实生活中所造就的“互惠”。正因为文化之间互惠的重要,

真正平等的知识互惠才需要我们给予切实的关注。朱教授的观点一方面触及到文化对话的核心问题,另一方面,也因为它直击中国文化现实处境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内学者的争论。

来自伦敦大学的人类学家柯西莫·真列(Cosimo Zene)教授审慎地提出应为“互惠”确立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界定。首先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从纯粹的西方立场来进入讨论的,包括他所采用的方法论也同样只是出自西方语境。他认为整体的方法论应是复数,但相对于每一个文化个体来说,真实的情况是无法避免单数方法论的局限。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他认为:所谓“互惠”,是指身处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各方,都持有彼此交流的意愿;具体包括两个基本层面:自身呈开放形态以便让他者理解自我文化的本真情状;与此同时,展开对作为他者的异文化的同步理解。然而,只看到这一点还非常不够,在文化交流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危险:那就是在此过程中权力的参与。这种参与通过政府、学术体制等权力机构的运作来驱动文化交流的最终结果。然而,我们所说的知识“互惠”并不是作为确定的必然结局、而是作为以平等为前提讨论的结果,作为一种期待而存在的,它在表述中描绘了一个文化交流的完满状态,但不会轻易落实在现实中。相比之下,权力之间的较量就显得更为有效了。这个观点在尼采、福柯、伽达默尔那里不断得到强调与充实,真列教授在本次会议上的阐述多少对朱苏力教授的发言形成了回应。他进一步将这种文化交流中的实际情形比拟成人类学中“礼物交换”的行为:在物质性的礼物背后,深藏着不宜表达的利益冲突。针对此种状况,真列教授提出了一个颇为独到的解决方案。他引入勒维纳斯十分注重的“自我所赋有的伦理责任”(conosess)这一概念,并赋予它崭新的含义。在基督教的传统中,“conosess”最为明确的意义是“自我所赋有的伦理责任”,他认为若淡化这一概念的宗教意味,则其直接的内涵所指向的是一种“积极的被动性”,正是这一点可以作为实现“互惠”甚为奏效的前提。因为这个词汇突出了真正交际过程中肉身的实在性与直接性,这种实在性与直接性是无可替代却又极易被人忽视的。身体面对身体,最大的障碍与互惠的最大可能同时展现出

来,在这样的情境中,人对自我责任的担负才可能是真切与主动的,即达成上文所述之“积极的被动性”。这种担负在直接性当中有效地抵挡了权力对文化选择的支配与压迫。尽管很多学者在文化对话中对权力因素的存在以及由此而来的危机深有同感,但他们并不倾向于把权力之间的征服简单地归结为文化特质上的天然冲突。事实上,对于强势、弱势文化的划分更多地体现了文化之外的决定性因素所具有的驱动能量。从“全球化”到“知识互惠”的过渡,学者们的视点逐渐集中到概念本身的可能性上来。无论对于来自西方的学者,还是中国文化处境当中的知识分子,文化的互惠与权力的争夺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状况使得任何一方都陷入某种“危机”之中。当然,不同文化境遇所面对的“危机”又可以引发出不同的话题。

法国塞尔日——蓬图瓦兹大学的阿兰·李比雄教授以莱布尼茨的如下观点为出发点,详细地分析了西方文明历程所特有的“危机”形态。莱布尼茨认为:任何可能的人类历史都可以用语言来描述,语言的规范性体现在运用有限的文字表述人类进化的一切可能,这就必然构成文化整体对部分的侵害。李比雄教授认为当前的知识危机状态与当年莱布尼茨的上述构想极有关联。但首先需要肯定的是知识在变化中的危机状态是知识的常态:知识作为有机体在与变动不居的外界发生互动的时候必然面临不足与缺乏,于是调动自身的衍生能力产生更多的新信息,而过多的信息、过多的告知行为又会反作用于知识的常态。因此,危机是知识构成性的内在状态。包括互惠知识在内,任何知识的建构都会和外在世界的更新发生交汇、碰撞以及良性或非良性的反应;否则,知识论与方法论都会变得固定而停滞。如果莱氏的构想得以成立,那就会形成一个完整、封闭而稳定的方法论类型。在逻辑上,又可分为三种可能的形态:第一是完全杜绝崭新方法论的涌现;第二种是虽然可能出现新的知识类型,但是在已有的知识论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因而这种创新并不涉及本质,也就无法真正深化我们的认识——这正是西方文化所遭遇的“危机”的真相。不能不说莱布尼茨的构想在思想背景方面为这种封闭的文化发展体系提供了长足的支持,但显然这两种情况都不是

我们理想的知识互惠方式；第三种可能则代表着知识更新的方向——所产生的新知识以西方文化以外的他者文化为基质，或将两种异文化完好结合在一起。具体来说，西方文化在莱布尼茨构想的影响之下将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于明确、清晰的命题，而任何非概念形态的思维方式，如中国传统思想，都被排除在考虑之外。由此，莱布尼茨构想给予互惠知识的启示首先是方法论上的：它要求对于我们已掌握的一切知识都不应放弃反思；它在逻辑上主张以尽可能小的集合，无限地、不重复地表达人类整体的处境。尽管在操作上这难于做到，但它能激发对这种有限性的反思：之所以有限实际上与该文化所持的语言个性有关。对印欧语系的文化来说，有限的字母经由词、句将有限性逐步传递到思想表达中去；但汉语就不同了，它的构词机制尽管同样是有限的（符合莱氏构想），然而汉语可以突破拼音文字恪守的矛盾率，从削弱逻辑力量开始逐步使自己成为更加开放的知识系统。可见，互惠知识的实质在李比雄教授那里就是相互从对方那里得到对自己文化的启示。

前面几位中西方学者的立场基本上都紧紧围绕自身文化的处境而展开。

有关互惠利益的最大化策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汀阳教授在他的题为“‘欧亚’概念作为一个互惠利益最大化策略”的发言中提出了另一个视角。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赵汀阳教授更加明确地将对“全球化”概念的反思定位在实践策略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哲学层面。在他看来，Globalization的整体想像可以分解为 Eurasia（欧亚大陆），Pacifia（环太平洋地区）和 Atlantia（环大西洋地区）三个以地域为基点的混合关系，这种关系要求我们给予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复合性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上谋求一种在混合因素条件下的综合最优策略。首先，他提出互惠博弈（Reciprocal game）的假定，从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各方所能够追求的利益最大化可能性上说，只有当各方

的利益都最大化才能使得任何一方的利益最大化。赵汀阳教授主张以中国传统思想中“形”“势”的概念来假定一个政治/文化实体，并将其表述为特定的资源配置：两个以上的政治/文化实体之间的静态关系就构成一个特定状态的“形”；同时，在非合作博弈的情况下，如果进入动态（dynamic）关系的理解，如何利用实际上的“形”而构造一个最有利的“形”这样一种最大化行动策略，就必需理解各种潜力和倾向的可能变化，也就是“势”，以便知道最大化的可能性。他认为文化是一种最长远的和最大的利益；并且，文化必须保持自身成为一种有活力有创造性的“文化行动”。据此出发考察 Eurasia、Pacifia 及 Atlantia 三个互动关系在利益最大化方面所蕴涵的三种潜在方向。他认为：Eurasia 概念是更有潜力的文化概念：欧洲与中国在地理上的远距离造成他们之间政治利益冲突的相对最少；而欧洲和中国在文化上也足够远，没有亲源，同样深刻厚重，两种完全不同的深厚文化传统相会时能够产生互相反思能力的最大化；文化资源很大程度上来自深厚的传统，而深厚的积累会形成文化的分量，有深厚文化背景的欧洲和中国属于同等的文化等级，尽管文化风格非常不同，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具有更深层次的可交换性。因此，Eurasia 概念蕴含着发展一种最大化互惠的知识共同市场甚至知识共同体的可能。赵汀阳教授提供的方法在于他以直面文化冲突的方式将其中的困顿难解之处纳入到思考的前提中去，从而使互惠知识的讨论获得了更为有效的深入。

这次会议还详细讨论并展示了有关“在线教育”的设想和蓝图，在此从略。

展望

最后，应该说明此次会议是中国与欧洲多次联合讨论“文明之间——互惠认知”链环中的一个环节。它承接了 2000 年在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召开，由著名学者埃柯（Umberto Eco）主持的，以“方法论——互惠认知”为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在某些方面拓宽了

上次会议取得的各项成果，同时也为即将于今年 11 月在比利时召开的，更大规模的互惠认知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提出了新的思考和问题。我们坚信这种持续不断的关于互惠认知的讨论一定会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为人类文明的多元共存和发展寻求出一条最好的途径。

(赵 嘉整理,发言未经本人审阅)